

长江中下游周代前期青铜器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陈 小 三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原 030006)

目 次

- 一 高砂脊及炭河里铜器群
- 二 一类纹饰特殊的青铜器
- 三 五类形制特殊的鼎
- 四 燕尾式矛与甬钟
- 五 春秋早期相关的鼎和盘
- 六 铜器纹饰方面的证据
- 七 年代与历史背景
- 八 余论

有关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周代青铜器群年代的认定,学术界素来分歧较大〔1〕。近年来,平顶山应国墓地所出个别铜器,可支持长江中下游地区周代青铜器年代早到西周早、中期〔2〕,但这毕竟是零星线索。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传世及出土文献中均有西周王朝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联系的记载。为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徽屯溪、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地发现了典型周文化风格的青铜器,而中原地区却未见到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器?究竟是没有发现,还是我们没能识别出来?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并回答。

在周代青铜器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强调中原地区的对外影响,只有个别学者认识到中原地区周代青铜器中有外来因素〔3〕,加之学术界一般默认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多是当地铸

〔1〕 上海博物馆:《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2〕 陈小三:《应国墓地新见铜盃与吴越地区西周铜器断代》,《考古》2015年第5期。

〔3〕 Virginia C.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28(1974/1975), pp. 77-107; 罗森:《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与南方的青铜文化交流》,《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罗覃:《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青铜盃新探》,《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林巴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南方因素——以铸铆结构为例的初步探讨兼及泉屋博古馆所藏凤柱斝的年代和属性》,泉屋博古馆、九州国立博物馆编《泉屋透赏——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透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2015年。

造,所以在周代青铜器的研究上,缺乏与周邻文化铜器进行对比研究的视角。这种情况制约了我们对中原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周代青铜器的认识。

本文通过识别一批中原地区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地区风格的青铜器,来阐释中原地区西周青铜器在其发展和演变中也曾受到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原地区西周青铜器中的外来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铜器断代,以及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都有积极的意义。

从考古分期的角度来看,春秋早期可以和西周晚期划作一个阶段^{〔1〕}。春秋早期铜器的造型、纹饰延续了西周晚期的式样,直到春秋中期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另外,从制作工艺来看,西周至春秋早期,鼎、簋等器类的耳、足普遍与器身浑铸,而到了春秋中期,铜器上的耳、足通常分铸。有学者将西周至春秋早期这一时段称为“周代前期”^{〔2〕},本文沿用这一概念。

一 高砂脊及炭河里铜器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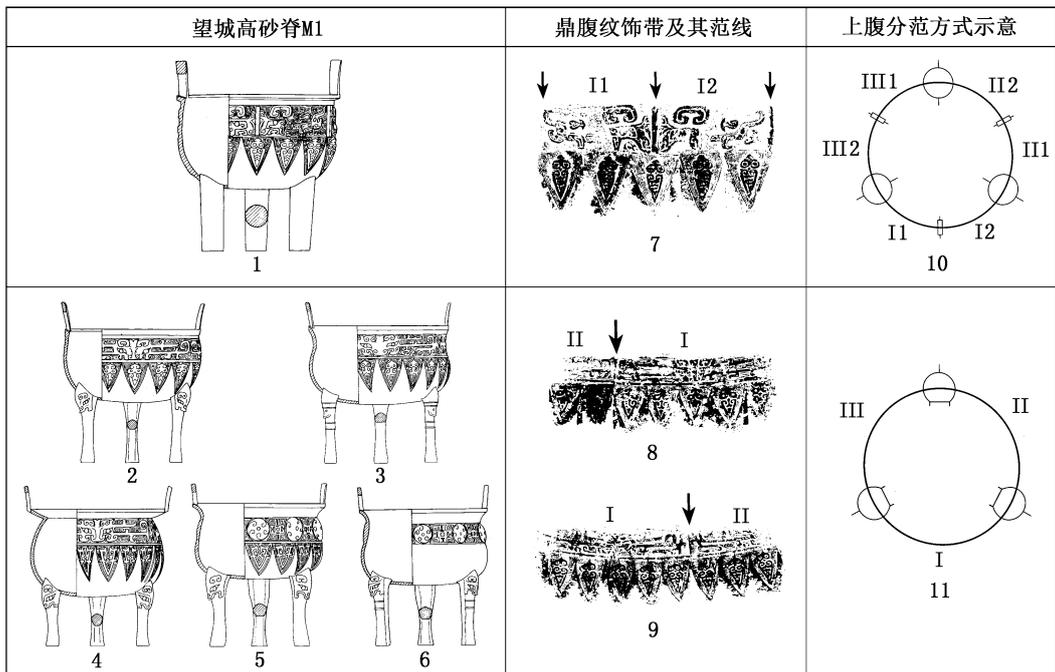
青铜器铸造是一项复杂、精密的生产活动,制作和组合陶范是这项活动的核心。以往青铜器研究中,更多地关注形制及纹饰的差异,鲜有涉及不同区域间铜器的铸造方法是否有别。近年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铜器材料,为我们认识其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分范方式提供了资料保障。除了传统的器形、纹饰分析外,本文也尝试比较二者分范方式的差异。

首先来看中原地区青铜鼎的分范方式。从孝民屯出土的陶范来看,殷墟青铜器的分范方式很灵活。殷墟一期之前,铜鼎不带顶范,铸型为 $3fz(Y)$ 。殷墟一期,多流行带有顶范的 $3fz+3z+1(\Delta)$ 铸型。殷墟二期以后,腹足之间多使用水平分范的 $6jf+3z+1(\Delta)$ 铸型。殷墟末期,明器化铜器多为简单的三分铸型,实用器仍流行腹足之间有水平分范的铸型方式。西周早期,制作精良的铜鼎大多沿用从殷墟二期开始出现的腹足之间使用水平分范的 $6jf+3z+1(\Delta)$ 铸型方式^{〔3〕}。综合而言,中原地区从二里头到晚商时期,青铜鼎(尤其是颈部)的分范,是朝着多段、重复的方向发展。这种多段重复的纹饰,只需要制作一节陶模,便可翻制出一周的陶范。本文将这种分范方法概括为极度分范法。

〔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吉川弘文馆,1984年;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13年。

〔2〕 孙华:《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远望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3〕 刘煜、张昌平、胡东波、岳占伟:《技术选择和技术风格的形成——以鼎为例考察二里头时期到晚商青铜器的技术演进》,陈光祖主编:《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岳占伟、岳洪彬、刘煜:《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陈建立、刘煜主编:《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张昌平、刘煜、岳占伟、何毓灵:《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考古》2010年第8期。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f表示腹范,z表示足范,j表示颈范,fz表示腹范和足范相连,jf表示颈范和腹范相连。字母前面的数字表示用范的数量。Y表示鼎底部有“Y”字形范线,△表示鼎底部有三角形范线。如殷墟二期开始流行的铸型方式为 $6jf+3z+1(\Delta)$,表示由六块相连的颈、腹范和三块足范外加一块底范组成,且底部范线为三角形。



图一 湖南望城高砂脊 M1 出土铜鼎

1、7. M1 : 18 2、8. M1 : 4 3、9. M1 : 6 4. M1 : 7 5. M1 : 3 6. M1 : 2 10、11. 分范方式示意

再来看商末周初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在湖南望城高砂脊 M1 中^{〔1〕}，地方化风格的铜器与中原地区铜器共存，为我们分析中原地区铜器与地方化风格的青铜器在纹饰、器形以及分范方式上的差别提供了绝佳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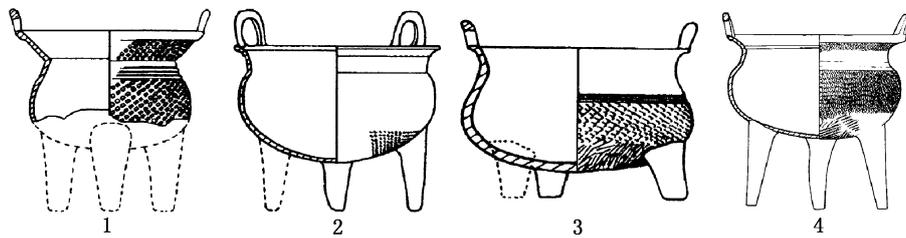
湖南望城高砂脊 M1 出土的六件鼎，其中 M1 : 18 鼎上腹饰以短扉棱为界的三组兽面纹加龙纹，下腹饰蕉叶纹。该鼎主体纹饰凸起，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地，且主纹饰细阴线纹。这是中原地区晚商至周初流行的典型的三层花纹样(图一，1、7)。M1 : 18 鼎也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的铜鼎非常接近，如小屯 M5 : 758 妇好鼎^{〔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射妇_彝鼎^{〔3〕}。从分范方式来看，该鼎每道扉棱处即为范线，颈部的纹饰带是用三组六块外范相连构成的(图一，7、10)。因此，从造型、纹饰及分范方式来看，M1 : 18 鼎无疑是一件中原风格的铜器。

其他五件铜鼎上腹无短扉棱。其中 M1 : 4(图一，2)、M1 : 6(图一，3)、M1 : 7(图一，4)三鼎上腹饰三组卷尾的兽面纹，下腹饰蝉纹。M1 : 3(图一，5)上腹饰相间的四叶目纹与火纹，下腹饰蝉纹。M1 : 2(图一，6；图版壹，1)上腹纹饰与 M1 : 3 近同，下部光素。

〔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4期。

〔2〕 拓古(张昌平)：《望城高砂脊与西族》，《江汉考古》2001年第3期；施劲松：《对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铜器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12期。

〔3〕 图像参看《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图二 地方化风格陶鼎

1—3. 望城高砂脊(M19: 1、M14: 2、M19: 30) 4. 随州叶家山(M50: 6)

从分范方式看,M1: 4、M1: 6、M1: 7 三件兽面纹鼎,腹部纹饰为三组,且大致对称,每组纹饰中央没有分范的扉棱,分范位置应在兽面纹尾部相接的地方(图一,8、9)。因此,这三件鼎颈部的分范均为三块范组合而成(图一,11)。其余两件鼎发表资料有限,但从图版来看,M1: 3 鼎腹中央没有范线,颈部纹饰带也应是三分范。M1: 2 鼎未发表拓本,或与 M1: 3 鼎近同,颈部纹饰带也应是三块外范组合而成。

从整体造型来看,M1: 18 鼎深腹,圆柱足,器体厚重,是典型的中原地区风格的铜鼎。而其余五件鼎器壁较薄,腹部较浅,口径较腹深大,整体呈宽扁状,而且除 M1: 4 之外,均为束颈鼎。

从足部形态来看,M1: 18 鼎为圆柱足。其余五件鼎均为细长、两端膨大的兽蹄状足,上端饰兽面,内侧扁平。这种兽蹄足与中原地区从晚商以来就流行的柱状足或兽蹄足的风格全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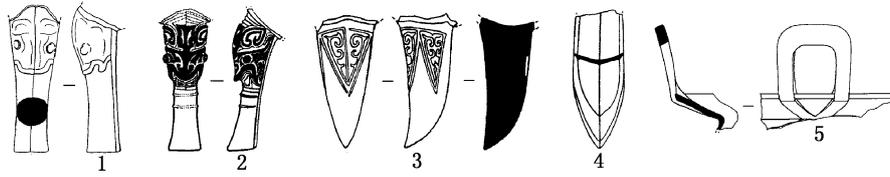
综上,M1: 18 鼎与其余五件鼎可能是不同作坊生产的。M1: 18 鼎的产地可能在中原地区。其余五件地方化风格的鼎中,M1: 4 颈部没有收束,可能是受中原地区影响。其他四件鼎中有三件束颈鼎和一件折沿鼎,而高砂脊遗址发现的陶鼎,也有束颈(图二,2、3)和折沿(图二,1)两种形态。很明显,这些铜鼎是仿制土著陶鼎而成。近年,湖北叶家山墓地也发现了束颈的陶鼎(图二,4)^[1],应是受到了高砂脊文化的影响。因此,高砂脊出土的五件鼎地方化特征明显,只是局部造型及纹饰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

类似的器物还见于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2]。该遗址虽未出土完整的铜容器,但有内侧为平面的兽蹄形鼎足(图三,1^[3]、2),与高砂脊所出五件鼎风格相同。此外,该遗址还出土有一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 年第 7 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261 页,文物出版社,2013 年。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6 期。

[3] 原报告将 M4: 2 鼎足的剖面绘为圆形,文字描述为“足内侧平”(《文物》2006 年第 6 期)。2016 年 8 月,笔者到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观摩了实物,这件鼎足内侧的确略微凸起,范线位于鼎足内侧凸面的两侧,所以它的铸造方式应与内侧为平面的鼎足相同。



图三 炭河里遗址出土铜器

1—3. 鼎足(M4 : 2、M2 : 6、M2 : 1) 4. 刮刀(M9 : 1) 5. 鼎耳(M4 : 19)

件折沿鼎的口沿(图三,5),与高砂脊遗址 M1 : 7 鼎相似。该遗址中出土有一件刮刀(图三,4),同类型的刮刀也见于高砂脊遗址^{〔1〕}。该遗址还发现一件尖锥状的鼎足(图三,3),其风格与安徽屯溪土墩墓中所出尖锥足小鼎风格一致^{〔2〕}。炭河里遗址发掘报告将所发现的鼎口沿分为三型,其中 A 型(M8 : 11)与中原地区铜鼎十分接近,C 型(图三,5)与高砂脊遗址 M1 : 7 相近。而 B 型的主要特征是,侈口,立耳薄而宽,均残甚,这种宽而薄的立耳,也与高砂脊遗址出土五件鼎相近。

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这种类型的铜鼎在湖南宁乡坝塘镇保安村^{〔3〕}、长沙县金井乡^{〔4〕}、资兴旧市^{〔5〕}、株洲白关^{〔6〕}、湘潭青山桥窖藏^{〔7〕}中也曾发现。此外在广东惠平^{〔8〕}、博罗横岭山^{〔9〕},甚至远在广西贺州马东村也发现过春秋时期的这种鼎^{〔10〕}。其中资兴旧市春秋墓出土鼎(图版壹,2)与长沙金井乡发现鼎(图版壹,3)形制十分接近,而且鼎耳内壁纹饰也很接近(中原地区鼎耳的纹饰一般位于外侧),均带有花冠、身体呈“∞”形的夔纹。无论位置还是纹样均极富地方特色,与中原的夔纹明显有别。

总而言之,这类风格特殊的铜器,从分布地域及沿用时间上来讲,都是地方化风格突出的铜器群。高砂脊 M1 : 18 鼎与其余五件鼎,在整体造型、足部形态、分范方式方面的不同,可以看作是晚商到周代中原风格青铜鼎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鼎的差异。

当然,在湖南地区还发现了大量典型商文化风格的晚商青铜器^{〔11〕}。这些铜器颈、腹纹饰带都是多段重复的,其铸造方式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基本没有差别。从炭河里城址发现的铜

〔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4期。

〔2〕 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3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炭河里遗址管理处、宁乡县文物管理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宁乡青铜器》,4页,岳麓书社,2014年。

〔4〕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县出土春秋时期越族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岳麓书社,1984年。

〔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文物考古队:《资兴旧市春秋墓》,《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岳麓书社,1982年。

〔6〕 雷芬:《株洲白关西周晚期越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7辑,《求索》增刊,1999年。

〔7〕 袁家荣:《湘潭青山桥出土窖藏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岳麓书社,1982年。

〔8〕 杨豪:《介绍广东近年发现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61年第11期。

〔9〕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172、173页,彩版9,科学出版社,2005年。

〔10〕 贺州市博物馆:《广西贺州市马东村周代墓葬》,《考古》2001年第11期。

〔11〕 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

器来看,与地方化风格铜器共存的还有一件中原风格浓郁的卣盖,这件卣盖上的纹饰分为四组八块纹饰单元〔1〕。这种现象或许说明,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器生产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一部分延续了中原地区晚商以来的极度化分范法,有一些延续了二里冈以来腹部三分范的传统。这种差别究竟是人群的不同还是文化选择的差异,抑或是当地存在多个青铜器生产中心,目前还很难回答。

二 一类纹饰特殊的青铜器

西周王朝的核心区域——周原和丰镐遗址以及平顶山应国墓地发现了一组纹饰风格较为特殊的铜器,即丰镐遗址张家坡西周墓地 M73〔2〕和长安普渡村长由墓〔3〕所出铜鼎,周原遗址扶风齐镇所出鼎〔4〕、岐山京当凤雏村窖藏所出鼎〔5〕及平顶山应国墓地所出类似纹饰风格的铜鼎〔6〕。

张家坡 M73 所出铜鼎(图四,1),上腹所饰勾云状夔纹较为特别。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到西周中期铜器上的夔纹一般有细密的云雷纹衬地,如果主体纹饰平整,其上还会有细阴线纹装饰(图五,1—3)。如果主体纹饰是凸起的弧面状的细凸线纹,则其上一般不再装饰阴线(图五,4,5)〔7〕。而张家坡 M73 出土鼎,器腹夔纹共分三组,每组由两个头部相对的夔组成〔8〕,而且相对的夔纹中央没有范线,由此可知鼎腹纹饰带是由三组外范加工而成。张家坡 M73 所出铜鼎腹部的勾云状夔纹花冠朝上,而卷尾朝下,类似“∞”形,形式活泼。其主体为“∞”形的勾云状夔纹,纹饰平整却无阴线装饰。这件铜鼎的纹饰风格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带有阴线装饰的平面化夔纹截然不同。

〔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6 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

〔4〕 罗西章:《扶风出土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4 期;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 6 卷,巴蜀书社,2005 年。本文周原地区铜器插图,未特殊说明的均采用《周原出土青铜器》一书。

〔5〕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简报》,《文物》1979 年第 11 期;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 5 卷,993—995 页,巴蜀书社,2005 年。

〔6〕 平顶山市文管会:《平顶山市新出西周青铜器》,《中原文物》1988 年第 1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上),图 118-1,大象出版社,2012 年。

〔7〕 纹饰拓本采自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110—113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主体纹饰为弧面状的铜器,纹饰带较宽者少数有阴线。如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 M1017:10 鼎,见谢尧亭、王金平、杨及耘、李永敏、李建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2010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69 页,文物出版社,2011 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136—137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报告中线图对夔纹身部的描摹偏细,不够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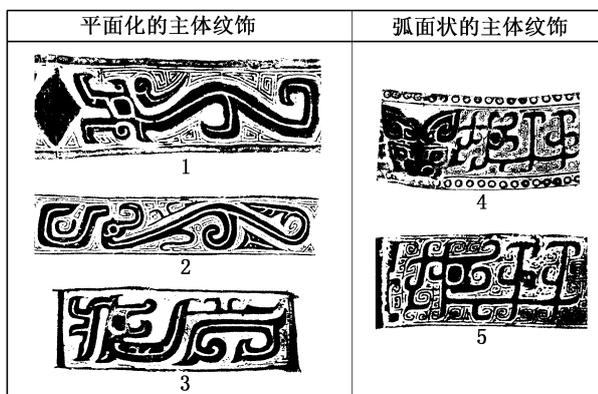
长由墓中所出 3 号鼎，腹部也饰有勾云状夔纹^{〔1〕}，而夔纹花冠与尾巴均向上卷（图版壹，4^{〔2〕}；图六，5）。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件鼎颈部纹饰与上述张家坡 M73 出土鼎“∞”形勾云状夔纹略有差别。长由墓 3 号鼎腹部纹饰带仅在鼎足上方相对应的位置有范线，可见腹部纹饰带也是三块范，而且该鼎腹部正中央用两只相对的卷体夔纹进行补白，平顶山应国墓地 M85^{〔3〕} 及湖南宁乡黄材^{〔4〕} 所出盃的裆部也有这种夔纹补白的现象。这两件铜盃均是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5〕}。



图四 特殊纹饰青铜器

1. 张家坡墓地 M73 出土鼎 2. 长由墓 3 号鼎

利用小夔纹在腹部或者裆部进行补白，反映出铜器的外范设计并不十分精准，这种作风与中原地区流行的腹部纹饰带长度等分的极度分范法不同，反映出外范的设计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此外，长由墓 3 号鼎的鼎耳为方折状^{〔6〕}（图四，2），也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圆形或圆角方形不同。



图五 典型夔纹

1—5. 图片采自《商周青铜器纹饰》(307、315、318、309、312)

类似的纹饰风格还见于 1971 年在周原扶风齐镇发现的鼎（图版壹，5）。该鼎

上腹也饰一周“∞”形勾云状夔纹（图六，4），夔纹平整，没有装饰阴线纹，而衬地的云雷纹为长条状，与中原地区云雷纹多为方形或团状的现象明显有别。这种纹饰风格不见于周原其他青铜器，可能有外来因素^{〔7〕}。

从分范方式来看，齐镇鼎腹的纹饰带为三组相对的“∞”形勾云状夔纹。相对的两条夔纹，中间没有分范，构成了一组纹饰。很明显，这件鼎腹部的纹饰带为三块范，这种作风与上述张

〔1〕 纹饰拓本采自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报告中图七将 3 号鼎与 6 号鼎的编号误置，图版三中铜鼎的编号正确。

〔2〕 照片是笔者 2014 年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时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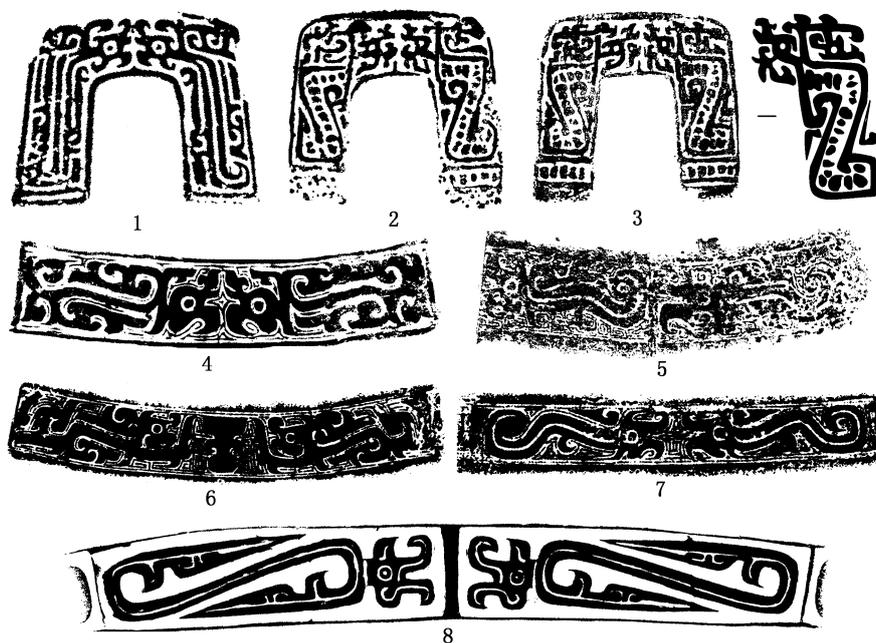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下），彩版 94—3，大象出版社，2012 年。

〔4〕 Chen Jianming, Jay Xu and Fu Juliang, *Along the Yangzi River: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Bronze Age from Hunan*,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2011, p82—83; 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133 页，岳麓书社，2013 年；炭河里遗址管理处、宁乡县文物管理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宁乡青铜器》，30 页，岳麓书社，2014 年。

〔5〕 陈小三：《应国墓地新见铜盃与吴越地区西周铜器断代》，《考古》2015 年第 5 期。

〔6〕 图片采自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图版三四，文物出版社，1981 年。

〔7〕 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322 页，文物出版社，2009 年。



图六 特殊夔纹的比较

1. 屯溪 M3 : 11 鼎耳 2. 资兴旧市 M276 : 6 鼎耳 3. 长沙金井乡采集鼎耳 4. 齐镇鼎 5. 长
由墓 003 鼎 6. 应国墓地 M48 : 2 鼎 7. 应国墓地采集 00764 鼎 8. 凤雏_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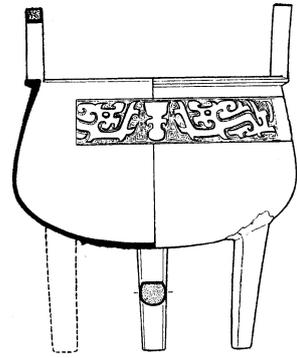
家坡 M73 出土鼎以及高砂脊 M1 出土的五件地方化风格铜鼎的分范方式一致,而与上述中原地区从晚商流行的颈部极度分范法明显不同。

齐镇鼎底部有铸造留下的三组均匀套叠的三角纹(图版壹,6)。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鲜见,而在安徽屯溪墓地中却有两件鼎(M3 : 11、M1 : 10)底部均有这种现象。其中屯溪 M3 : 11 鼎(图版贰,1),其形制与望城高砂脊发现的土著风格铜鼎颇有近似之处,而且《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中公布的该鼎腹部纹饰带拓本,正好是腹部纹饰带的三分之一,这张拓本的中央,纹饰完整,未见分范的痕迹,而在拓本的两侧都有残留的范线痕迹。因此,这件鼎腹部的纹饰带也是三块外范组合而成的。由此可见,这件鼎在形制和制作方法上均与高砂脊发现的地方化风格铜鼎接近。

屯溪 M3 : 11 鼎耳部内侧的纹饰(图六,1)也为“∞”形的勾云状夔纹。这种纹饰也见于上述资兴旧市 M276 : 6 鼎、长沙金井乡采集鼎的耳部内侧(图六,2,3;图版壹,2,3)。从形制来看,它们均是长江中下游的土著铜器。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鼎耳部内侧纹饰,尤其是屯溪 M3 : 11 鼎耳的纹饰竟与扶风齐镇鼎(图六,4)、长由墓 3 号鼎(图六,5)、张家坡 M73 出土鼎相同。这些勾云状夔纹格极为活泼,与中原地区的夔纹全然不类,综合铜器形态、器底的范线以及腹部纹饰带的分范方式来看,这种“∞”形的勾云状夔纹显然具有共同的文化来源。屯溪 M3 : 11 等三件鼎,除了耳内侧的纹饰及腹部为三块范的分范方式与上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铜

鼎相似之外，它的整体形态与望城高砂脊遗址发现的那类延续时间很长的浅腹鼎十分接近。这些因素启示我们，这种特殊的勾云状夔纹应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地方化纹样。

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在平顶山应国墓地 M48 也有发现〔1〕。M48：2 鼎腹也饰“∞”形勾云状夔纹（图六，6；图七），其腹部纹饰带的范线有三条，分别与三足相应。腹部的三组纹饰为两两相对的夔纹，中央有鼻梁相隔，但鼻梁的正中央没有范线，因此鼎腹纹饰带是由三块范组合而成的。这与长江中下游铜鼎的分范方式接近。



图七 应国
墓地 M48：2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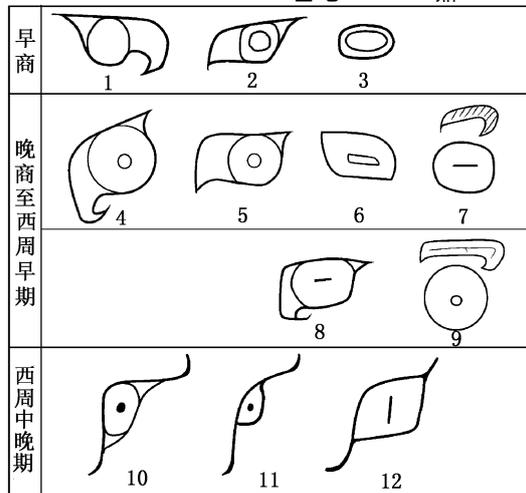
此外，岐山京当凤雏村青铜器窖藏中的一件甗〔2〕，其颈部的主体纹饰为一组风格特殊的夔纹，夔纹身部有细阴线纹装饰（图版贰，2；图六，8）。这组夔纹头部较圆，上、下颚卷曲明显，与中原地区常见的夔纹风格不类，却与上述勾云状夔纹的头部风格极为相似。该甗所饰夔纹身部为“∞”形，与齐镇鼎、平顶山鼎及张家坡鼎的勾云状夔纹接近，只是纹饰风格较为简单。

综上，张家坡鼎、普渡村鼎、齐镇鼎、凤雏甗和平顶山鼎无疑都具有长江中下游地方化风格。其形制特征可概括如下。

第一，鼎腹圆鼓，腹最大径偏下，张家坡 M73 出土鼎甚至在下腹最大径处形成一道折棱。

第二，张家坡鼎、平顶山鼎足部下端较细，这与周原流行的粗实柱足或蹄足的风格不同，也是一种地方化因素。

第三，从纹饰风格看，本文所举长江中下游地方化风格的铜器除主体纹饰为平面化的勾云状夔纹外，其眼睛均直接用阴线画成圆形，一些中央有圆点。这种作风与中原地区商至西周早期流行的平面化的兽面纹不同，中原地区的兽面纹用边框表示眼睛的轮廓，学术界俗称为“臣字目”。少数没有边框者，中间用一短线表示眼珠，或用眉毛来表现（图八，1—9）。到西周中晚



图八 中原地区兽面纹及夔纹眼睛

1—12.《商周青铜器纹饰》(223、63、152、212、31、211、141、60、217、319、316、269)

〔1〕 平顶山市文管会：《平顶山市新出土西周青铜器》，《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上)，大象出版社，2012年。

〔2〕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简报》，《文物》1979年第11期；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5卷，993—995页，巴蜀书社，2005年。

期,兽面纹在中原地区不再是主流纹饰,继而兴起的各类夔纹^{〔1〕},眼睛也多有边框(图八,10—12)。因此,眼睛表现方式也可以作为判断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的重要标志。

三 五类形制特殊的鼎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五类在形制上受到长江中下游青铜器影响的鼎,第一类是一种大口浅腹鼎,第二类是两种束颈鼎,第三类是一种腹部有凸起条带的鼎,第四类是一种垂腹鼎,第五类是浅腹矮足鼎。

(一)大口浅腹鼎

上文已述,望城高砂脊墓出土的地方化风格铜器还见于宁乡炭河里、湘潭青山桥等地,在偏北的区域也有这类铜鼎分布。

平顶山应国墓地采集到一件鼎(编号 00764),鼎壁轻薄(图版贰,3)^{〔2〕}。其风格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铜鼎风格不同。该鼎微束颈,扁腹,口径明显大于腹深,鼎足细长,上端膨大、饰兽面,足内侧为平面。这些特征均与望城高砂脊地方化风格铜鼎十分接近。这类鼎应是由望城高砂脊铜鼎发展而来的^{〔3〕},只是该鼎颈部夔纹与中原地区夔纹整体风格十分接近。从铜鼎的分范方式、足部形态及夔纹眼睛的表现方式来看,这件鼎与中原地区铜鼎还存在差异。如该鼎在两条夔纹相对的地方是完整的云雷地纹(图六,7),而不像中原地区是在两条夔纹相对的地方多是范线或者扉棱。结合纹饰拓本可知,这件鼎腹部的纹饰带,是由三块与鼎足相对应的外范铸造而成的,与望城高砂脊地方化风格铜鼎以及上文分析的扶风齐镇鼎、张家坡长由墓 3 号鼎、应国墓地 M48 : 2 鼎的分范方式一致。

应国墓地 M242 中也发现一件鼎(M242 : 13),器身光素,呈扁圆状,口径明显大于腹深,柱足内侧也为平面状(图九,1)^{〔4〕}。这些特征无疑与望城高砂脊遗址地方化风格铜鼎近似。因此,该鼎也有长江中下游地区风格。

在更北的地区也有这种类型的铜鼎分布。晋南曲村墓地 M6081 出土一对南宫姬鼎,鼎身扁圆,口径明显大于腹深(图九,2)^{〔5〕},形制上显然与望城高砂脊遗址发现的地方化风格的器物有联系。需要提及的是,在叶家山 M1 中曾经发现一件形制极为特殊的小鼎(图版贰,4)^{〔6〕},腹部扁圆,显然也和高砂脊遗存有密切的关系,只是颈部的纹饰带为中原地区常见的一

〔1〕 西周早期末叶到西周中期流行的大鸟纹,眼睛一般是圆形。多少有写实的特征,与兽面纹的眼睛作风应该区别对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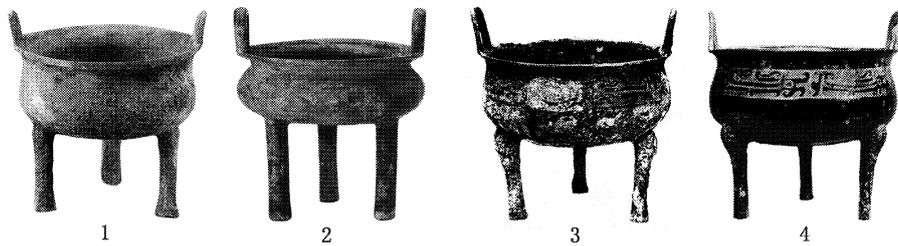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下),彩版 45-1,大象出版社,2012 年。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上),大象出版社,2012 年。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上),150 页,大象出版社,2012 年。

〔5〕 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第二册,335—350 页,科学出版社,2000 年。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1 期。简报中“父乙亚宣共分裆鼎”插图编号误为 M1 : 14 的图版(图二三,图六二-3、4),该鼎正确的图版编号应为图二二、图六四、图八〇-7。



图九 大口浅腹鼎

1. 应国墓地 M242·13 2. 曲村墓地 M6384·9 3. 传出洛阳鼎 4.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鼎

首双身夔纹。从整体形态来看,这件鼎兼具中原与长江中下游两种因素。

孙海波编纂的《河南吉金图志贗稿》中著录了一件传出洛阳的夔纹鼎^{〔1〕}(图九,3),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中还著录了一件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的铜鼎^{〔2〕}(图九,4)。这两件鼎的整体形制、足部形态均与高砂脊 M1 发现的地方化风格铜鼎接近,而且两件铜鼎腹部的夔纹眼睛均直接用圆圈表现,也应是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年代大约在西周早、中期。

综合来看,第一类鼎整体造型及纹饰风格与上述分析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一类纹饰特殊的铜器群相同。鉴于在湖南宁乡炭河里及望城高砂脊等地均有这种大口浅腹铜鼎及陶鼎,因此,湖南北部的沿江地区大概是这种类型铜鼎的原产地。

(二)束颈鼎

束颈鼎依足部形态,可分二种。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中原地区晚商到西周早期流行的束颈鼎。

殷墟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束颈鼎数量并不多。根据岳洪彬对 2001 年之前殷墟发掘材料的统计^{〔3〕},一百三十三件圆鼎中,束颈鼎的数量总共有七件^{〔4〕}。其中有二件(岳洪彬所谓的甲 Bb I 式鼎和甲 Ca I 式鼎各 1 件),颈部转折明显(图一〇,1、2),在岳洪彬的分期中相当于殷墟二期早段,这种转折明显的铜鼎并没有延续下来;从殷墟二期晚段到殷墟四期,中原地区流行的束颈鼎是一种颈部没有明显转折,呈慢坡状的束颈鼎(图一〇,3—5)。西周早期之后,这种颈部为慢坡状的束颈鼎就不流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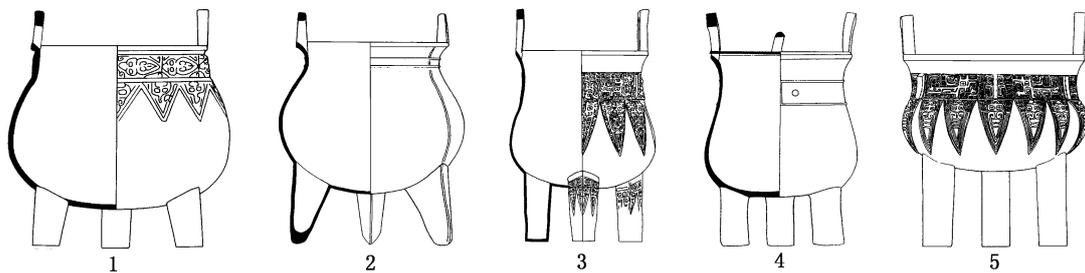
1. 第一种束颈鼎 足部细瘦,在湖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均有分布。

〔1〕 刘庆柱、段志洪主编:《金文文献集成》第 21 册,648 页,线装书局,2005 年。

〔2〕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34 页,吉川弘文馆,1984 年。

〔3〕 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37—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4〕 需要说明的是,岳洪彬划分的甲类 B 型鼎即为束颈鼎,共十二件。本文所指的束颈鼎仅包括岳文的甲 Ba 型鼎五件、甲 Bb 型 I 式鼎一件、甲 Ca 型 I 式鼎一件,共七件。



图一〇 殷墟出土束颈鼎

1. 殷墟 YM331 : R2051 2. 殷墟 YM331 : R2050 3. HPKM1435 出土 4. 武官 M229 : 3 5. 武官 GM874 : 9



图一一 窃曲纹

1. 万城北子鼎 2. 应国墓地 M85 : 14 鼎

首先看湖北江陵万城发现的北子鼎。该鼎颈部饰变形窃曲纹(图版贰,5)^{〔1〕}。林巳奈夫指出,这是一件具有地方化风格的铜鼎^{〔2〕}。与万城北子鼎最为接近的铜器,是平顶山应国墓地 M85 : 14 鼎(图版贰,6)。

这两件鼎共同的特征是鼓腹下垂、束颈、颈饰两周凸弦纹。这两件鼎的颈部纹饰接近,这些特征与中原地区的窃曲纹相似。两件鼎腹部纹饰带由三组相对的窃曲纹组成,在每组窃曲纹的中央,可以看到模仿中原地区扉棱及扉棱两侧鼻梁形饰的一组纹饰^{〔3〕},其中万城北子鼎可以看到一处(图一一,1),平顶山 M85 : 14 鼎可以看到两处(图一一,2)。这类纹饰显然是对中原地区扉棱两侧鼻梁形饰的模仿,而且有所变异。这种纹饰还见于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出土的铜鼎上^{〔4〕}。所以,这种窃曲纹及变异的鼻梁形饰也可能是具有长江中下游地区风格的一类纹饰。

相似的器物在山东黄县庄头村西周中期墓中也曾发现^{〔5〕}。黄县发现的束颈鼎,颈部饰窃曲纹(图一二,1),共出的有一对熊奚作宝壶和一对饰大鸟纹的芮公方座簋。该墓年代相当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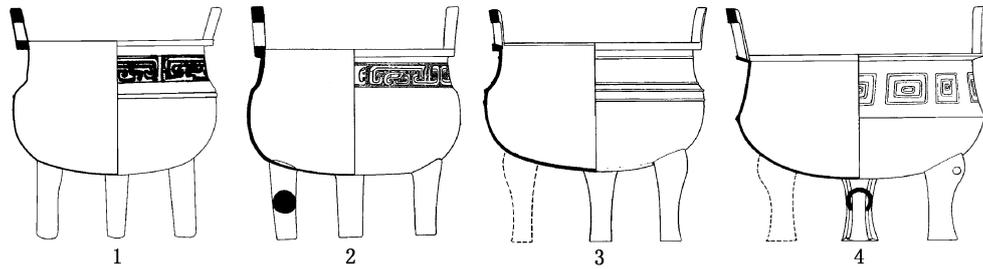
〔1〕 王毓彤:《江陵发现西周铜器》,《文物》1963 年第 2 期。

〔2〕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34 页,吉川弘文馆,1984 年。

〔3〕 晚商铜器群可以见到大量的这种扉棱两侧的纹饰,在完整的兽面上这种纹饰正好处在兽面中央鼻梁上。林巳奈夫称其为“苞”。参看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8 页,常耀华、王平、刘晓燕、李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

〔4〕 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5 期;杨正宏、肖梦龙主编:《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37 页,文物出版社,2008 年。

〔5〕 王锡平、唐祿庭:《山东黄县庄头西周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 年第 8 期。



图一二 束颈鼎

1. 黄县庄头鼎 2. 1954 普渡村 M2 : 24 鼎 3—4. 曲村墓地(M6384 : 9、M5189 : 2)

西周中期偏早阶段。黄县位于胶东半岛,且该墓发现铜器来源复杂,出现背景尚不能详知。但这件铜鼎无论形制还是颈部的纹饰,均和万城鼎及应国墓地 M85 : 14 鼎相似。

此外,同类型的鼎在天马一曲村墓地也有发现。曲村墓地 M6384 发现的束颈鼎(图一二, 3),腹部转折明显,颈、腹有四周凸弦纹^[1],该墓出土器物背景复杂,有一件晚商铜簋,还有一件不对称形铜钺和一件形制奇特的铜矛。不对称形铜钺可能和南方有联系^[2]。报告认为,这座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另一件出自曲村墓地 M5189 中(图一二,4),该鼎颈部饰一周方格纹^[3]。报告中将这座墓葬定在了西周最晚期^[4]。这件鼎腹部的纹饰为方格纹,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的铜器及几何印纹陶上的纹饰接近^[5]。陕西历史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束颈鼎,其腹部转折明显,颈部饰夔纹^[6]。从鼎足形态及颈部装饰的夔纹来看,这件鼎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到西周晚期。

春秋早期,这类束颈鼎主要见于山东南部和中部。临沭黄庄发现一件这种类型的鼎^[7]。枣庄小邾国墓地 M2、M3 中均发现有这种束颈鼎,其中 M2 中发现四件同类型的有盖鼎,M3 发现三件同类型的鼎(图版叁,1)。M2 为邾庆墓,M3 为其夫人秦妊^[8]。此外,在临朐泉头村墓乙中也发现一件这种风格的鼎^[9]。这些鼎足部形态、器身造型与西周早、中期的湖北江陵

[1] 邹衡主编:《天马一曲村(1980—1989)》第二册,499 页,科学出版社,2000 年。

[2] 豆海锋、刘莲芳:《有关不对称形铜钺起源问题的新线索》,《文博》2010 年第 5 期。

[3] 邹衡主编:《天马一曲村(1980—1989)》第二册,387 页,科学出版社,2000 年。

[4] 这座墓葬还出土有一件鼎、两件簋、一组盘等,这些铜器上多饰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常见的重环纹。这座墓葬发现一对簋,簋耳为小环耳、略微上扬,是年代较晚的特征,年代定在春秋早期偏早阶段可能更为恰当。

[5] 肖梦龙:《母子墩墓青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文物》1984 年第 5 期。

[6]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76 页,文物出版社,1960 年。

[7] 全国基建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工作委员会:《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中国古典文艺出版社,1956 年。

[8]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枣庄市东江周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1 年。本文所用的 M2、M3 的图像采自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政协台港澳侨民族宗教委员会:《小邾国遗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年。

[9] 临朐县文化馆、潍坊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临朐发现齐、邾、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万城鼎以及应国墓地 M85 出土鼎十分接近。尤其是小邾国墓地发现鼎,颈部纹饰与上述西周时期的小邾国铜鼎近同。东周时期,这种类型的鼎极少见,目前仅在山东地区有分布。这种鼎的出现是传统因素的流传,还是一种复古现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至于这类铜鼎的来源,湖北北部江陵万城发现铜鼎年代最早,可能是本地因素。山东地区出现的这类鼎,可能也和长江中游地区相关。另外一种可能是,江陵万城铜鼎和山东地区所见鼎,都是受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出现的。只是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未见到十分接近的器物。

山东地区、曲村墓地 M5189 发现铜鼎鼎足粗壮,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流行的鼎足风格接近。其余年代较早的鼎,鼎足普遍偏细,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尖锥状足,如万城、应国墓地 M85 出土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鼎也可归入这种类型。一类是兽蹄状足,如曲村 M6384:9 鼎。但总的来说,鼎足普遍偏细是比较典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风格。

2. 第二种束颈鼎 长安普渡村长白墓中 3 号鼎,颈部饰特殊的勾云状夔纹为典型的长江中下游风格铜器。该墓所出 2 号铜鼎(图版叁,2),束颈,颈饰窃曲纹^[1]。同类的鼎在 1953 年普渡村 M2 中也有发现(图一二,2)^[2],该墓所出尊和簋是非常典型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而同出的爵和鬲,年代明显偏晚。这表明该墓随葬铜器的来源比较复杂。长白墓 2 号鼎及普渡村 M2:24 鼎,整体形态、颈部纹饰都与北子鼎以及应国墓地 M85:14 鼎接近,但两鼎器体厚重,做工精致,又与长白墓 2 号鼎及普渡村 M2:24 鼎不同。它们浑厚的造型、粗壮的鼎足,与中原地区的铜器风格相似。因此,这两件鼎应是中原地区对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仿制。

赛克勒收藏的西周青铜器中也有两件束颈鼎,其中一件颈饰顾首夔纹(图版叁,4),另一件颈饰细夔纹(图版叁,3)^[3]。这两件鼎与普渡村发现两件鼎近似。

以上四件束颈鼎柱足粗壮,应是在中原地区生产的,只是束颈及颈部的窃曲纹显然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

综上,这两种束颈鼎年代较早者束颈转折明显,如北子鼎、应国墓地 M85:14 鼎以及黄县庄头鼎,它们从形态到纹饰均十分接近,显示了共同的文化来源。转折明显的束颈以及尖锥状的鼎足,这些特征均不是中原地区固有的传统。中原地区发现的这类束颈鼎在西周中晚期颈部收束部分变长,纹饰也发生了变化,而且个别铜器的足部特征也出现中原地区流行的粗壮兽蹄足。春秋早期,这种束颈鼎目前仅见于山东地区。

西周中期中原地区也可以见到模仿这种束颈鼎的器物。如长安普渡村出土的两件鼎,粗壮的足部和中原的铜鼎相似。同时也存在颈部纹饰和鼎足形态中原化的例子,如赛克勒所收

[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

[2] 石兴邦:《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记》,《考古学报》第 8 册,1954 年。

[3] 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ig19&-18.

藏的两件鼎。

(三)腹部有凸起条带的鼎

目前所见这种鼎共三件,其整体形态与束颈鼎较类似。两者最大的差别是,鼎腹外壁有一周带状隆起且上下各有一周凸弦纹,壁内凹。一件出土于平顶山应国墓地 M84(图版叁,5)^{〔1〕},一件出于湖北枣阳吉河(图版叁,6)^{〔2〕}。还有一件出自河南驻马店遂平沈寨乡^{〔3〕}。除枣阳吉河鼎隆起的条带为素带外,其余两件鼎隆起的条带上饰交错的斜角云纹。

这三件鼎除了总体形制接近外,足部均上端略大、内侧为平面,鼎耳均为绶索状,也是其突出的特征。应国墓地 M84 出土鼎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遂平沈寨乡鼎以及枣阳吉河鼎的年代应大约与此相当。

从分布地域来看,枣阳位置略靠南,平顶山位置靠北,驻马店位置居于两者之间。鉴于这种鼎特殊的形制、稀少的数量以及分布地域的相对集中,或可认为这种鼎是这一地域内的土著风格铜器。分布相对靠北的平顶山应国墓地出现的这种鼎,可能是受到邻近或偏南地区土著文化的影响出现的。如果结合第一种类型束颈鼎来看,这两类束颈鼎的来源和产地,似乎可能在河南南部或湖北北部这一地域内。

(四)垂腹鼎

垂腹鼎根据其腹部特征,又可细分为二种,一种是具有浑圆的垂腹,一种是垂腹下出现了明显的折棱。

1. 浑圆状垂腹鼎 这类鼎目前在中原地区可以确定的有二件。一件是长白墓 6 号鼎^{〔4〕},另一件是曲村墓地 M7113 出土鼎^{〔5〕}。长白墓 6 号鼎,颈部纹饰带为三组鸟纹^{〔6〕}(图一三,1)。从形制来看,鼎足上端较粗,下端较细,且内侧为平面。纹饰有三个特点,一是鸟纹的样式在中原地区很少见;二是在两组鸟纹相对之处是一种变形的鼻梁形纹饰;三是衬地的云雷纹风格涣散,也和中原地区严谨的风格有别。

曲村 M7113:5 鼎,颈部纹饰带为三组变形的鸟纹(图一三,2)。从形制来看,鼎足上端较粗,下端较细,内侧为平面。从纹饰来看,这件鼎的纹饰非常浅,从纹饰的尾部可以看出,本来要表现的是鸟纹,但鸟纹的头部又十分抽象,与中原地区写实的风格不同。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 I》,大象出版社,20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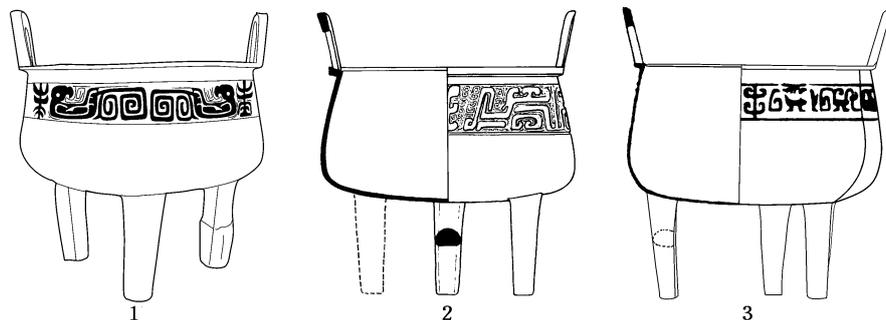
〔2〕 徐龙国:《湖北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94 年第 4 期。本文图像采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49 页,文物出版社,2007 年。

〔3〕 该鼎未见正式报道,笔者 2014 年 8 月在驻马店市博物馆观摩了实物,其形制、纹饰均与上述两鼎接近。

〔4〕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

〔5〕 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 年。

〔6〕 本文所用图像采自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文物出版社,1960 年。



图一三 垂腹鼎

1. 长白墓 6 号鼎 2. 曲村墓地 M7113 : 5 鼎 3. 大港母子墩鼎

与上述两鼎风格接近的是长江下游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的云形鸟纹鼎〔1〕以及溧水乌山一号墓发现的鼎〔2〕。大港母子墩中出土的铜鼎共二件，形制近同，纹饰有别，两件鼎均为垂腹鼎。其中的云形鸟纹鼎，颈饰一周粗线条的变形鸟纹，两组鸟纹相对处也有变异的鼻梁形饰。此外，鼎足上端较粗，下端细瘦，内侧也为平面（图一三，3；图版肆，1）〔3〕。这件鼎一耳与一足相对，耳足为四点式配列，中原地区这种耳足组合方式主要流行在殷墟一期之前、殷墟二期之后，铜鼎的耳足一般是五点式配列。因此，从形制、纹饰及鼎足配置方式来看，其制作地应在丹徒一带。

溧水乌山一号墓所出垂腹鼎，腹饰线条较细的变形鸟纹，鸟纹用细阴线勾勒（图版肆，2）〔4〕。鼎腹倾垂，足部上端较大、下端较细，内侧为平面。从形制及纹饰来看，此鼎也是在溧水当地制造的产品。

四件垂腹鼎在形制及纹饰细节上也有很多共性。首先，上述四件鼎颈部纹饰带中央均有变异的鼻梁形饰。相对而言，曲村 M7113 出土鼎的鼻梁形饰相对简洁，其余三鼎相对繁复。此外，第一类束颈鼎中的江陵万城北子鼎和平顶山应国墓地 M85 : 14 鼎也有变异的鼻梁形饰，而且腹部倾垂，与这类垂腹鼎十分接近。由此可见，这种变异的鼻梁形饰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铜鼎上特有的现象，是对中原地区标准鼻梁形饰模仿变异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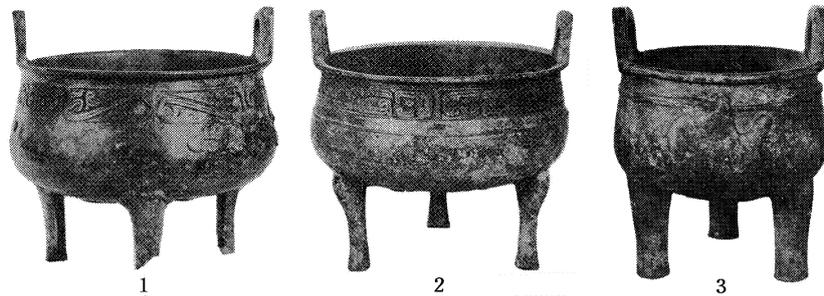
再从器身的鸟纹来看，除长白墓 6 号鼎有完整的鸟纹之外，其余三件鼎的鸟纹均不表现头部。这种作风与中原地区大异其趣。从丹徒大港母子墩发现的鼎来看，这种过度减省鸟头的纹饰可能是长江中下游特殊的纹饰。溧水乌山一号墓鼎没有表现鸟头，而且已经完全用细凸线表现鸟纹。这种用细凸线来构图，可能是受到当地印纹硬陶或原始瓷器纹饰表现手法的影响。曲村 M7113 出土鼎从纹饰带的尾部看，原本应表现的是鸟纹，也未突出鸟头，再结合该鼎

〔1〕 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5 期。

〔2〕 刘兴、吴大林：《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 年第 4 期。

〔3〕 图片及拓本采自镇江博物馆：《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8 年。

〔4〕 图版采自镇江博物馆：《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53 页，文物出版社，2008 年。



图一四 1964年张家坡西周墓出土鼎
1. 5号鼎 2. 6号鼎 3. 7号鼎

的整体造型以及变异的鼻梁形饰来看,这件鼎应是一件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长白墓6号鼎虽然有完整的鸟身,但这种尾部方折卷曲的鸟纹在中原地区也极为少见^{〔1〕}。这些鼎腹部纹饰带均为腹身和鼎足相连的三块范铸造而成的,其分范方式也和长江中下游流行的三分范一致。综合这些鼎的整体造型、纹饰风格以及铸造方式,可以判定长白墓6号鼎、曲村M7113鼎均是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

2. 下腹有折棱的垂腹鼎 1964年,在沔西张家坡村东北清理了一座残墓,其中发现有鼎、盥、壶等铜器^{〔2〕},其中的三件铜鼎(编号5—7号)颇有特色。

张家坡所出5号鼎鼎足为尖锥状(图一四,1),足部特征与万城北子鼎这类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相似。其颈部纹饰为“∞”形的顾首夔纹。垂腹,腹部出现一周明显的折棱。这些特征均和中原的铜鼎不同,而安徽舒城^{〔3〕}、无为^{〔4〕}、巢湖^{〔5〕}、铜陵^{〔6〕}、芜湖^{〔7〕}等地区都曾征集到这种形制的鼎(图版肆,3—5),安徽所见的这类鼎,年代最早的可到西周中期,年代较晚者已到春秋中期,可见这种类型的鼎在当地延续时间之长。6号鼎束颈,下腹圆鼓,饰中原地区典型的窃曲纹(图一四,2),与万城北子鼎的纹饰一脉相承。这件鼎的鼎足纤细,与第一类大口浅腹鼎的足部特征接近,颈部微束也与第二类束颈鼎的特征接近,因此这件鼎也应是受长江中下游铜器风格的影响。故而,张家坡西周墓发现的5号、6号两件铜鼎均是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

不唯如此,个体较大的7号鼎(图一四,3),其铭文为“繇^{〔8〕}侯获巢,俘厥金冑,用作旅鼎”,其年代属于西周初期。繇可能就是《路史·国名纪》中的谣,为偃姓国,与同宗的群舒之巢交

〔1〕 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考古队:《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9期。

〔3〕 安徽博物院:《江淮群舒青铜器》,图10,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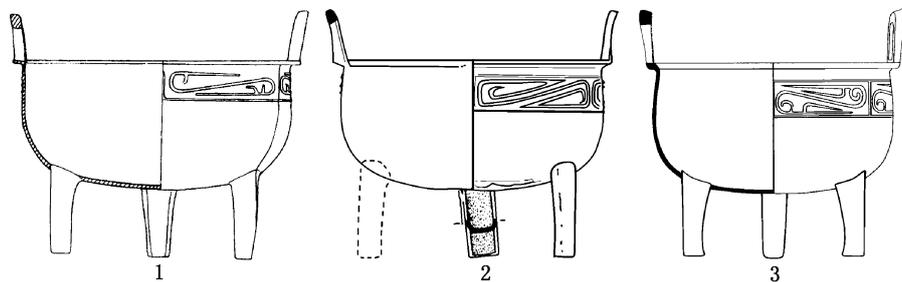
〔4〕 安徽博物院:《江淮群舒青铜器》,图75、79,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年。

〔5〕 安徽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图66,文物出版社,2014年。

〔6〕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图12,文物出版社,2006年。

〔7〕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图6,文物出版社,2006年。

〔8〕 曾宪通:《说繇》,《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



图一五 浅腹矮足鼎

1. 张家坡 M253 : 4 鼎 2. 平顶山 M85 : 14 鼎 3. 西南呈 M6 : 4 鼎

恶,在伐巢之役中有所俘获,可见繇国与巢距离不远^{〔1〕}。这种个体较大,周身素面,仅在颈部有一周凸弦纹的铜鼎,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数量很少。相反,在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则多有发现,如仪征破山口^{〔2〕}、丹阳司徒砖瓦厂^{〔3〕}。此外,该鼎铭文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巢国相关,而且 5 号垂腹鼎鼎腹出现折棱,也与安徽地区的铜器有联系。

此外,这组鼎都经过一定程度的修补。“5 号鼎是将破裂口的内外贴上两叶铜片,再用一枚或数枚铆钉牢固地卡着”。“7 号大鼎是用合范灌补的,鼎的破裂口相当大,补痕长 22.4、宽 15.3—23.8 厘米”。这些特征,显然也和中原地区铜器明显不同。

张家坡西周墓的三件铜鼎均显示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大量与长江中游相关的铜器集中出现在这座残墓中,只是该墓被扰乱,我们难以再细究其出现的文化背景了。

(五)浅腹矮足鼎

这类铜鼎见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 M253 : 4 鼎(图一五,1)、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 M85 : 14 鼎(图一五,2)、山西长子西南呈 M6 : 4 鼎^{〔4〕}(图一五,3)三鼎鼎腹较浅,足部矮短细瘦,这些特征均与中原地区的铜器不类。

在驻马店市博物馆收藏一件出自西平县谭店乡李村的一件青铜鼎。这件鼎腹部形态与上述三件鼎极为相似,甚至颈部的纹饰也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这件鼎的鼎足更为矮短^{〔5〕}。而这种矮短的鼎足,大量见于江苏丹阳司徒砖瓦厂发现的多件铜鼎上(图版肆,6)^{〔6〕}。这种现象反映出在长江下游以及邻近地区,这种鼎足矮短的铜鼎确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1〕 陈秉新:《金文所见繇国考》,《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 年。

〔2〕 张敏:《破山口青铜器三题》,《东南文化》2002 年第 6 期。

〔3〕 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杨正宏、肖梦龙主编:《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8 年。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西南呈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3 期。

〔5〕 2014 年 8 月笔者参观驻马店市博物馆所见。

〔6〕 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图版采自杨正宏、肖梦龙主编:《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64 页,文物出版社,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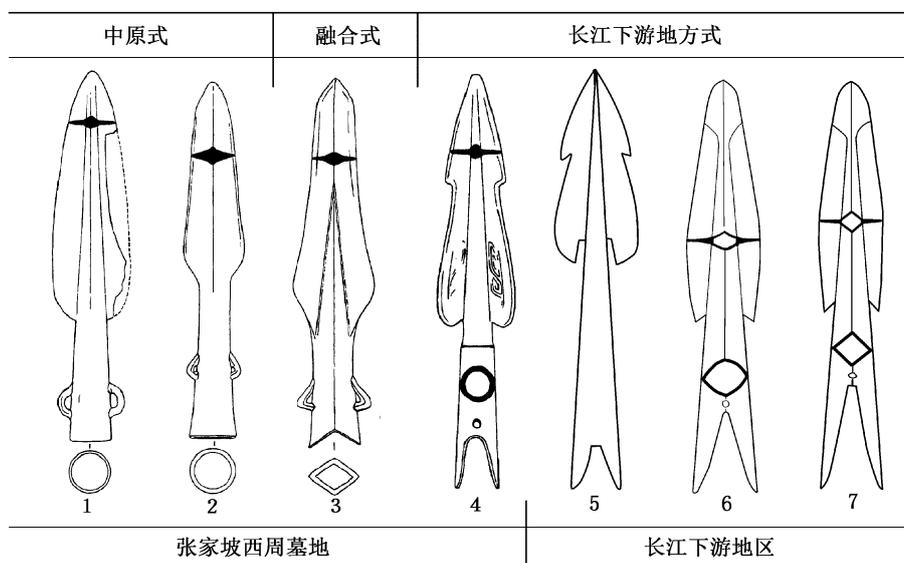
这四件鼎除了浅腹、矮足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颈部的纹饰都很接近，均是彻底线条化的“∞”形纹饰。

四 燕尾式矛与甬钟

中原地区所见燕尾式矛以及甬钟的出现和流行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密切的关系。

(一) 燕尾式矛

张家坡墓地还发现两件矛，銜尾为分叉燕尾式〔1〕。这种铜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较流行。



图一六 铜矛

1—4. 张家坡墓地(M315:3、M152:121、M258:7、M152:120) 5. 南京采集 6、7. 丹徒母子墩

张家坡 M152:120 矛(图一六,4),矛叶形态特殊,可与其勉强比较的是在南京采集的一件铜矛(图一六,5)〔2〕,年代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3〕。这件矛銜尾为分叉的燕尾,与丹徒母子墩西周墓出土的铜矛尾部接近〔4〕(图一六,6、7)。

张家坡 M258:7 矛(图一六,3),则显示了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因素的融合。该矛叶部形态与中原地区的铜矛很接近,而且銜上有两个用以捆绑铜矛的环耳,这是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式样,如张家坡墓地 M315:3 矛及 M152:121 矛(图一六,1、2);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是在銜上有两个相对的穿孔,用来插入销钉(图一六,6、7),直到东周时期长江中下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图 134、12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2〕 李蔚然:《南京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1960 年第 6 期;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 年第 2 期。

〔3〕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 年第 2 期。

〔4〕 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5 期。

地区仍然流行这种式样的铜矛。这种差别显示出两地的文化传统并不相同。张家坡 M258 : 7 矛的燕尾较短, 銎口剖面为菱形, 銎部风格与长江中下游铜矛的风格接近, 如在丹徒母子墩出土的铜矛中即有一件銎孔剖面为菱形(图一六, 7)。总之, 张家坡墓地 M258 : 7 铜矛叶及銎身的两个穿孔显示出具有中原地区风格, 但銎孔剖面及燕尾的风格又具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作风, 显示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二) 甬钟

关于甬钟的起源和发展, 学术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认为起源于中原地区〔1〕; 第二种认为源自南方〔2〕; 第三种认为甬钟是在北方编铙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地区铙的特征出现的〔3〕。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以往研究甬钟起源, 最早的例子是宝鸡竹园沟墓地 M7 出土的三件甬钟〔4〕, 近年在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 M111 中发现了四件甬钟和一件罍钟, 墓葬年代非常明确, 可以早到西周早期〔5〕。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甬钟资料, 其地理位置已在长江中游。

关于甬钟的起源, 我们还是需要从钟体来讨论。目前所见的年代较早的甬钟材料, 如叶家山 M111 : 8、13 两件编钟的边栏均为细凸线和中央带有圆点的连珠纹, 篆带上是极细的凸线纹, 这种极细的纹样在中原地区很少见(图版伍, 1)。中央带有圆点的连珠纹是长江中下游周代铜器上常见的装饰〔6〕。竹园沟 M7 : 11、12 两件甬钟的篆带上也饰极细的凸线纹〔7〕(图版伍, 2), 而晚商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上很少见到这种纹饰。但在中原地区发现的甬钟上, 这种极细的凸线纹流行的时间却非常长, 直到西周中期偏晚到西周中晚期之际才逐步消失, 被典型的中原风格的窃曲纹、重环纹取代, 同时长篇铭文开始在甬钟上流行。

庄白一号窖藏中的Ⅰ式疾钟, 纹饰仍为细凸线, 乳丁纹中央带有圆点(图版伍, 3)。Ⅱ式疾钟上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篆带、正鼓等部位的纹饰变为中原常见的平面化风格, 但篆带上的纹样仍保持了西周早期细凸线纹的样子〔8〕(图版伍, 4)。到西周晚期周厉王五祀鞮钟的篆带上〔9〕,

〔1〕 方建军:《西周早期甬钟及甬钟起源探讨》,《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

〔2〕 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岳麓书社,1984年;殷玮璋、曹淑琴:《长江流域早期甬钟的形态学分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高西省:《南北甬钟之关系及南北文化交流之检讨》,《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施劲松:《我国南方出土铜铙及甬钟研究》,《考古》1997年第10期;曹玮:《西周前期南北方钟的比较与北传路线》,《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3〕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

〔4〕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5〕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

〔6〕 林巴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7〕 图版采自山西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凤鸣岐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8〕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4卷,790、797页,巴蜀书社,2005年。

〔9〕 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煌》(青铜器卷),79号,三秦出版社,2006年。

纹饰也为平面化,但整体形态仍与细凸线纹相似;年代相近的柞钟^{〔1〕},篆带上的纹饰已经彻底中原化,是主体纹饰上带有阴线装饰的夔纹。篆带纹饰的这种变化显示出甬钟的风格逐步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接近的过程。

编钟的使用者地位较高^{〔2〕},从铜器铭文制作的角度看,在平面上制作铭文相对容易。甬钟的钲、鼓等部位均是面积较大的平面,而这些位置长期没有铭文,直到西周中晚之际,才出现铸造的铭文。上述Ⅰ式疾钟钲部铭文冲破上边的边框,Ⅱ式疾钟钲部铭文则规矩地位于边框内,而且钲部铭文位于边框内逐步固定化。因此,铭文从无到有,再到位置逐步固定,也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恰与编钟的纹饰逐步中原化同步。

甬钟纹饰的逐步中原化,长篇铭文从无到有,而且位置逐步固定,均表现出编钟逐渐与中原地区青铜器风格接近。这种平行渐变的演化可作为编钟外来的证据。形态原始的编钟的细阳线纹及中央带有圆点的连珠纹则显示出,这些铜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直接的联系。

五 春秋早期相关的鼎和盘

中原地区带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春秋早期铜器集中出现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器类主要是鼎和盘。

(一)鼎

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有二件形制特殊的垂腹鼎,分别是 M1715:2、M1819:6^{〔3〕}。

春秋早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铜鼎与西周晚期有密切的承袭关系,一类是延续了像四十二年、四十三年迷鼎这类鼎^{〔4〕},浅腹,底部宽缓,鼎身一般带有纹饰;另一类是延续了像西周晚期毛公鼎这种类型的鼎^{〔5〕},圜底,一般多为素面或颈部有一道重环纹。春秋早期的铜鼎大体流行这两种类型,和西周晚期流行的这两类鼎相比,只是腹部变得更浅^{〔6〕}。上村岭墓地发现的这三件鼎显然与春秋早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铜鼎不类。

上村岭 M1715:2 鼎腹倾垂,兽蹄足,足部上端有明显的装饰,可能为凸起的兽面。颈部饰一周极富特色的夔纹——主体纹饰的周缘均用阴线勾勒(图一七,1)。这种做法与中原地区

〔1〕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3年;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1卷,巴蜀书社,2005年;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煌》(青铜器卷),80号,三秦出版社,2006年。

〔2〕 常怀颖:《西周时期钟傅组合与器主身份、等级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图版13、58,科学出版社,1959年。

〔4〕 杨家村联合考古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眉县文化馆:《吉金铸华章》,文物出版社,2008年。

〔5〕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5卷,图版36,文物出版社,1996年。

〔6〕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吉川弘文馆,1984年;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图一七 春秋早期的垂腹鼎

1、2. 上村岭(M1715:2、M1819:6) 3. 鲁故城 M23:1

用阴线在主体纹饰的中央装饰的作风截然不同,而和江淮地区尤其是皖南^{〔1〕}及安徽的江淮^{〔2〕}地区发现的铜器风格极为相似,应是受到江淮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在器型上与这件鼎接近的器物有皖南铜陵顺安和南陵格林千峰山出土的鼎^{〔3〕},以及屯溪 M1:82 鼎^{〔4〕}。上村岭 M1819:6 鼎腹圆鼓,腹饰相对的斜角云纹(图一七,2)。这种纹饰在中原地区及江淮地区均有发现,但鼎足为尖锥状,显然不是中原地区固有的传统,而与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鼎接近。上村岭 M1715:2 鼎足上端有明显的凸起,同样的现象还见于舒城五里村鼎(图版肆,3),这与中原地区鼎足上端的兽面纹风格不同。宜昌万福垭发现的一件西周中期铜鼎,鼎足的兽面设计很特殊,整体呈起伏状,而且兽角与鼎腹下部相连(图版伍,6)^{〔5〕}。很明显,上村岭 M1715:2 鼎及五里村鼎足部上端的凸起是万福垭这类鼎足上端起伏状兽面的简化表现。

(二) 盘

上村岭虢国墓地还发现了二件纹饰风格特殊的铜盘,分别是 M1761:2 和 M1744:1。其中 M1761:2,林巴奈夫已经指出这是一件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盘^{〔6〕}。M1744:1 铜盘,外壁光素,内壁上饰一周鱼纹,内底正中为一条蟠蛇纹,蛇首较小,留白的位置均用卷云纹补白,卷云纹上均用双钩的阴线描绘轮廓(图一八)^{〔7〕}。这与长江中下游春秋时期铜器上的纹饰接近。

中原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铜盘内壁一般光素,不带繁缛的纹饰,圈足宽大、低矮,且一

〔1〕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17—19号鼎的纹饰均属于这种风格。

〔2〕 安徽大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14年。72、74—76号鼎的纹饰均属于这种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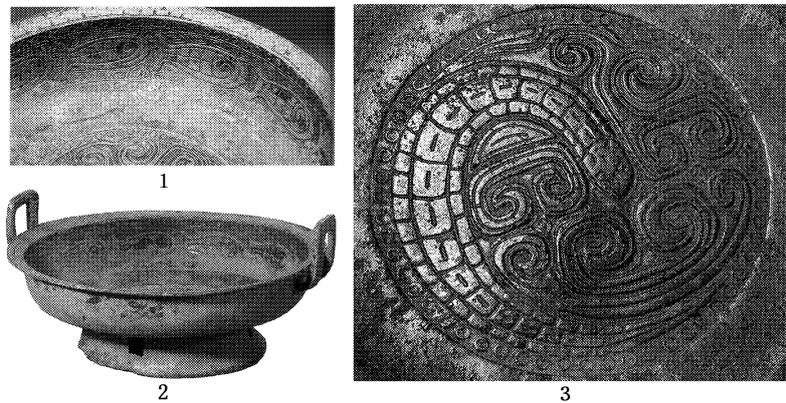
〔3〕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4〕 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彩版4-20,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宜昌博物馆:《湖北宜昌万福垭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4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苗与南土》,江汉考古编辑部,2016年,本文所用图版采自该书。

〔6〕 林巴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图版19,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图版11-13,文物出版社,1998年。



图一八 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铜盘(M1744:1)

般带有纹饰，一些盘的圈足下还带有三个小的支脚〔1〕。像上述铜盘这样，内壁布满纹饰，圈足相对细高，且有铸造留下的小孔的铜盘则广泛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类型的铜盘在河南南部(南阳、信阳)以及湖北、安徽均有分布，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兼具中原及长江中下游特征，一类是典型的长江中下游风格铜盘，兼具中原及长江中下游特征的铜盘。

1979年，在河南信阳潢川新砦村发现一批春秋早期偏晚铜器〔2〕。其中铜盘的整体造型与中原地区的铜盘接近，但纹饰风格十分特殊，盘腹和圈足分别饰窃曲纹和垂鳞纹，盘内底外围饰四组“∞”形的双首夔纹，中央为两条蟠结在一起的龙纹，其中一条主体纹饰上有双钩的阴线，另一条的阴线装饰则为“F”形的纹饰(图版陆，1、2)。这种“F”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上就是一种常见的纹饰，可见这件盘的造型和纹饰已经将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两类因素结合在一起了。

此外，郎剑锋指出，与铜盘共出的方彝是一件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3〕；同出的鼎鼎耳外侧有两列阴线与两列粟点纹相间；同出的鬯，器体浑圆，颈部极矮，通体光素，均是典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风格的春秋铜器。

1981年南阳的一座残墓中出土一组铜器〔4〕，其中的盘，情形与上述潢川铜盘近似。其整体形制与中原地区铜盘相似，而纹饰风格却具有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特征。

典型的长江中下游风格铜盘，1977年在湖北枣阳资山出土一件。此盘圈足较高，外腹饰斜角云纹，在内底饰细瘦蛇纹，留白使用卷体夔纹填补，夔纹轮廓用双阴线勾勒(图版陆，3、

〔1〕 参看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盘 56-64，吉川弘文馆，1984年。

〔2〕 郑杰祥、张亚夫：《河南潢川县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79年第9期。铜盘图片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111、112号，文物出版社，1998年。

〔3〕 郎剑锋：《吴越青铜器拾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

〔4〕 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图一九 铜盘

1. 枣阳曹门湾 M43 : 1 盘 2. 繁昌汤家山盘

4)^[1]。枣阳郭家庙曹门湾墓区 M43 出土一件盘。该盘圈足光素且有芯孔,内壁也有眼睛为圆形的盘龙纹(图一九,1)^[2],也是一件典型的长江中下游风格铜盘。

同样风格的铜盘在皖南青阳庙前汪村^[3]、繁昌汤家山^[4]均有发现,这是目前所见这类铜盘最靠南的分布点。汪村铜盘的作风比较粗糙。汤家山铜盘通高 18 厘米(图一九,2),盘颈部及圈足均饰“∞”形顾

首夔纹,内壁上端饰一周鱼纹,盘底中央有一蟠曲的动物纹,该动物躯干很大,头部极小。因此,在头部两侧又用卷体夔纹补白。这种纹饰风格与中原地区的纹饰特点完全不同。

中原地区发现的这些具有长江流域文化因素的春秋早期铜器主要集中于两类器物,一种是铜鼎,出土地点非常集中,均在上村岭虢国墓地。通过器物比较,我们可知,这些铜器的文化来源多与江淮地区相关。另外一类铜盘,从装饰风格来看,也和江淮或皖南地区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器物在上村岭墓地集中出土,可能反映了当时人群的流动。

类似上述分析的鼎和盘在山东地区也有分布。曲阜鲁故城 M23 : 1 鼎(图一七,3)^[5]与上述上村岭墓地的两件鼎整体形制接近。山东东南的临沂中沭沟出土的铜盘^[6],林巴奈夫先生已经指出也是一件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7]。此外在靠北的泰安肥城小王庄也发现有这种风格的铜盘(图版陆,5、6)^[8],在更北的海阳尚都村发现一件盘,也是这种风格^[9]。山东地区的这些器物显然也与江淮地区有关。

[1]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谷城、枣阳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1987 年第 5 期。图版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江汉汤汤——湖北出土商周文物》,120 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年。

[2]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郭家庙曹门湾墓区(2015)M43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 年第 5 期。

[3]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图版 60,文物出版社,2006 年。

[4]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繁昌县文化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3 年第 12 期。图像参看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图版 61,文物出版社,2006 年。

[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图版 74-1,齐鲁书社,1982 年。

[6] 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中沭沟发现三座周墓》,《考古》1987 年第 8 期。

[7] 林巴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 年。

[8]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 年第 5 期。图版采自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藏珍品·青铜器卷》,图 31,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04 年。

[9]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35 页,文物出版社,1959 年。

六 铜器纹饰方面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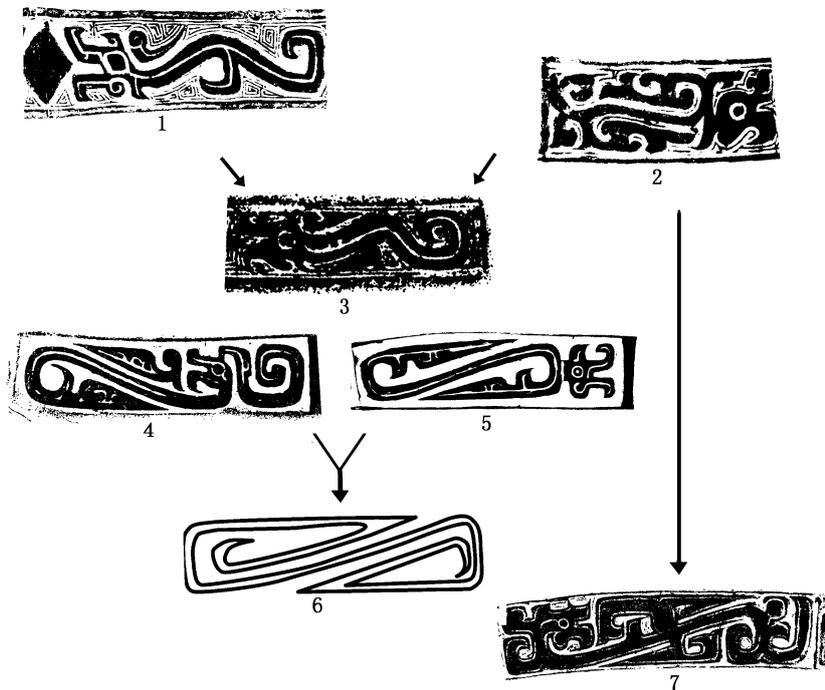
纹饰与器物密不可分，既然在中原地区能见到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那么纹饰方面也应有所反映。

西周中期偏晚阶段，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风格发生了巨变，之前流行的兽面纹、凤鸟纹等占主导地位的纹饰消失，纹饰朝向简朴化的方向发展，兴起了顾首夔纹、窃曲纹、重环纹、波曲纹及瓦棱纹等纹饰。其中顾首夔纹和一部分窃曲纹的兴起，可能也和长江中游地区存在联系。

（一）顾首夔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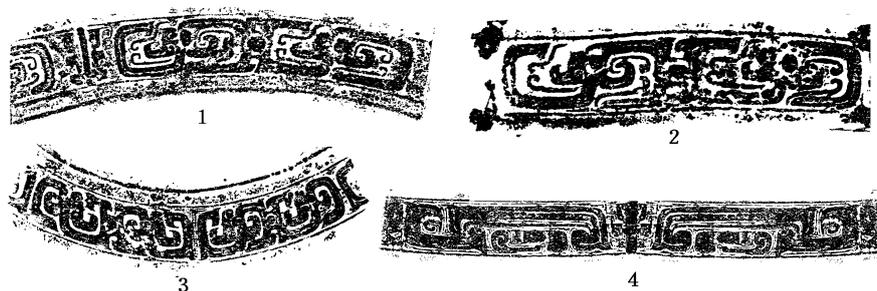
顾首夔纹是西周青铜鼎上非常流行的纹样，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纹样的来源并不清楚，这种顾首夔纹显然不宜理解为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流行的流线形夔纹的直接演化。如果考虑到身体呈“∞”且带有花冠的一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铜器群的存在，那么我们将西周中期流行的顾首夔纹看作是中原地区流行的流线形夔纹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形夔纹共同作用的结果，那种解释从形态演化上可能更为合理。

中原地区发现的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数量不是很多，但有不少纹饰即是简化的身体呈“∞”形的夔纹，甚至在河南潢川番伯盘、湖北枣阳资山及曹门湾盘上也有这种纹饰。



图二〇 “∞”形的夔纹演化序列

- 1.《商周青铜器纹饰》307号 2.扶风齐镇鼎 3.平顶山764号鼎 4.岐山凤雏村出土
5.1964年张家坡西周墓出土5号鼎 6.平顶山M85出土鼎 7.繁昌汤家山出土铜盘



图二一 长白山墓铜器所见窃曲纹
1-3. 连体状(盘、盃、簋) 4. 解散状(2号鼎)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汤家山铜盘圈足上就是顾首夔纹,与中原地区西周中期铜器上的顾首夔纹很接近,但盘外壁的纹饰尾部十分特殊,为歧尾,显然与西周时期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形纹饰(图二〇,2)有演化关系。

有鉴于此,尤其是凤雏铜_匜上的夔纹表现出的过渡性,笔者设想,这种“∞”形的夔纹可能是中原地区夔纹(图二〇,1)与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夔纹相互融合之后,首先产生了两类纹饰。第一类如平顶山采集的764号鼎的纹饰(图二〇,3),保留中原地区的因素多一些,但地纹风格及眼睛的表现方式均不是中原地区的特征;第二类如张家坡西周墓5号鼎及凤雏铜_匜(图二〇,4),这种风格的纹饰整体呈“∞”形,与长江中下游风格纹饰的相似程度高一些。第二类纹饰继续省减,就出现了平顶山M85鼎这种纹饰。

(二)窃曲纹

窃曲纹已有很多学者研究,其中彭裕商^[1]的分类最为扼要,他将窃曲纹分为两大类,甲类兽目与其他线条相分离(本文称为解散状窃曲纹),乙类兽目在线条之中或与线条相连属(本文称为连体状窃曲纹),甲类源自兽面纹,乙类来自夔纹^[1]。笔者基本同意彭先生的观点,只以共存关系明确的长安普渡村长白山墓进行分析^[2]。

长白山的年代相当于恭王时期,从簋、盘、盃的拓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器物所饰窃曲纹形态接近,左右两个朝向一致的夔纹首尾相连(图二一,1-3),形态上保持了较多夔纹的特点,已经出现了完整的窃曲纹图样,只是结构复杂,没有连体窃曲纹简洁。因此,彭裕商认为这类“兽目在线条之中或与线条相连属”的纹饰源自夔纹是可信的。

长白山2号鼎颈部所饰为解散状的窃曲纹(图二一,4),纹饰形态和万城北子鼎及平顶山M85:14鼎相近。这种解散状的窃曲纹整体来看其实是一种变形的兽面纹。这类兽面只突出了眼睛和躯干的一部分,兽面的下颌、后肢等部位全部省减了。

[1]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万城铜器群的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应国墓地 M85 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周代这类解散状的窃曲纹的来源，从现在的材料看，河南南部到湖北北部这一地域内，像上述北子鼎及平顶山应国墓地 M85：14 鼎这类纹饰，可能也是中原地区西周中期偏晚开始流行的解散状窃曲纹的一个重要源头。

顾首夔纹和解散状的窃曲纹均是西周中期偏晚阶段中原地区突然风行的纹饰。从纹饰类型学来看，关于这两类纹饰可能受到了来自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影响。

七 年代与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青铜器的断代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域考古工作的进展，尤其是宁乡炭河里、望城高砂脊、平顶山应国墓地以及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发掘，见到不少地方风格铜器与中原风格铜器共存例子，这对我们认识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青铜器的断代有重要的意义。

扶风齐镇鼎最初的报道认为，该墓年代相当于穆王以前〔1〕，《周原出土青铜器》认为，该墓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2〕。与齐镇鼎共存有一件象首纹铜鬲，与随州叶家山墓地 M65、M1 两座典型的西周早期墓中发现的象首纹鬲相比，足根明显偏短，将该墓的年代定在西周中期很合理。张家坡西周墓地 M73 鼎，共存器物有车马器、铜泡及玉、蚌饰等，没有特别明确的年代线索。发掘报告综合排比墓地发现的器物，认为这件鼎“流行的年代当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大约相当于西周中期的昭穆共时期”〔3〕。曲村墓地发现的南宫姬鼎，从共存的铜器来看，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4〕。平顶山应国墓地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从西周早期延续到了西周中期。叶家山墓地 M1 发现的形制特殊的铜鼎，根据共存器物来看，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5〕。江陵万城铜鼎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或西周早中期之际。本文所述束颈鼎中，像 1953 年普渡村鼎〔6〕、1954 普渡村长由墓 2 号鼎以及赛克勒先生收藏的两件鼎，均是中原地区仿制长江中下游青铜鼎出现的器物，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因此，从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青铜器的年代早到西周早期应该没有疑问。

西周早、中期的铜器铭文也显示出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如江苏丹徒发现

〔1〕 罗西章：《扶风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4 期。

〔2〕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 6 卷，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 年。

〔3〕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361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4〕 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第二册，335—350 页，科学出版社，2000 年。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1 期。

〔6〕 石兴邦：《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记》，《考古学报》第八册，1957 年；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考古学报》2012 年第 1 期。上述著作均将 1953 年普渡村 M2 的年代断为西周早期。据同出的铜鬲、爵等器物来看，这座墓葬大约相当于西周中期。

康王时期的宜侯矢簋,铭文提到分封给宜侯的地域内有三百条河,可确证吴国的始封地在今苏南地区〔1〕。此外,与昭王南征相关的铜器铭文中涉及的地名多与长江中游相关。如近年考古发现确证西周早期的曾国位于随州叶家山一带,而且在墓地中确实发现了可以和望城高砂脊以及宁乡炭河里遗址关联的陶器及铜器,可见考古发现与青铜器铭文可以相互证明。

西周中期,金文中所见的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主要是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之间的战争,集中体现在与伯雍父(亦称师雍父)及彳有关的一组铜器上〔2〕,伯雍父应为彳之字〔3〕。扶风庄白伯彳墓中出土的铜器铭文显示,伯彳曾受周王之命,帅虎臣抵御淮夷。𣪠鼎铭文记“师雍父省道至于胡”,遇彳 铭文中“师雍父肩使遇使于胡侯”,胡国是《左传》中记载的归姓胡国,在靠近淮河流域的地区〔4〕。录伯彳簋盖铭文说“王若曰:‘录伯,旧自乃祖考,有劳于周邦。’……录伯彳敢拜手稽首,……用作朕皇考彳 王宝尊簋”。录伯称其皇考为“彳 王”,可知录应为边鄙的国家〔5〕。录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六”,在今安徽六安一带〔6〕。伯彳很可能曾为六国国君,归顺周王朝不再称王了。由于录伯熟悉淮河流域风土、语言,所以负责联络当地的国家,这可能是他“省道至于胡”的重要背景。

这些西周中期的铜器,学术界一般认为相当于穆王时期,可与《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穆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呼应。

西周晚期,驹父盨铭文中提到,驹父受南仲之命,出使南淮夷。而𣪠 簋、师寰簋、𣪠生盨、噩侯驭方鼎、禹鼎、应侯视工鼎、兮甲盘等铜器的铭文均与伐南淮夷相关。铭文这些记载与《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的“厉王无道,淮夷入寇”,可以相互参照。

禹鼎铭文记噩侯率领南淮夷及东夷叛乱,禹受武公之命,成功平息噩侯的叛乱〔7〕。禹鼎属厉王时期,是张家坡各世并叔之后的又一世并叔〔8〕。张家坡并叔家族墓地中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容器及兵器,可能正是这种大历史背景的反映。

尽管中原地区发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数量不多,它们在中原地区出现,正是西周时期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见证。

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西周青铜器集中出土于六个区域,分别是湖北北部的江陵万城、河南南部的平顶山应国墓地、陕西长安张家坡及普渡村墓地、陕西周原地区的扶风及岐山、晋南地区。此外,山东地区也间或发现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器。应国墓地发现的具有长江

〔1〕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262页,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

〔2〕 罗西章、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雍父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

〔3〕 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4〕 唐兰:《周王鞅钟考》,《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裘锡圭:《说彳或簋的两个地名——“彳 林”和“胡”》,《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5〕 张政烺:《矢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张政烺文集·甲骨文与商周史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

〔6〕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141—14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7〕 黄天树:《禹鼎铭文补释》,《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8〕 李学勤:《禹鼎与张家坡并叔墓地》,《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

中下游风格的铜器明显偏多,如上文介绍的三件铜鼎。除应国墓地外,目前发现的长江中下游风格器物较多是叶家山墓地,不仅有高砂脊风格的陶鼎,也有受高砂脊遗存影响而出现的铜鼎。

周原、丰镐及晋南地区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铜器的确认,反映出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而平顶山墓地以及叶家山墓地发现的这些线索则反映出,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些文化因素,可能是通过湖北北部及河南南部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的,而分布在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的那些诸侯国,是当时沟通长江中下游土著与西周王朝高等级贵族的重要纽带。平顶山、叶家山墓地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偏多,正是这些分封在偏南位置的诸侯国架起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中原地区沟通的桥梁,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流与融合。

八 余 论

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发展序列完整,对周邻地区影响广泛,那么中原青铜器的发展是否也受到了周邻地区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公认有来自北方地区的影响^{〔1〕},因为这些铜器多是武器和工具,相对容易识别。在周代青铜容器研究上,与周邻文化对比研究同样必不可少,如此才能深入推进中原青铜器研究。

就长江中下游地区周代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来看,一方面,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中原的交流,器类多是容器,这些器物的原产地本来就在中原,尽管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器物在工艺、造型及纹饰上有了变异,也还是容易被我们忽略。另一方面,我们往往突出中原地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即便周邻地区的考古资料已很丰富,但对其文化发展程度仍然认识不足。这种情况下,往往忽视了中原地区对周邻文化因素的借鉴和吸收。

长江中下游地区所见的典型周代青铜器明显是受中原地区影响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中原风格铜器变异的因素。本文识别出的这批中原地区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器,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影响之后,又对中原地区产生的影响,中原地区所见的这些器物,其中既有直接传入的,也有一些是在造型和纹饰上受到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为中原青铜器的生产提供了给养,丰富了中原地区铜器的内涵。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80002)的阶段成果。本文在收集资料 and 修改过程中,得到井中伟、冯峰、高成林、徐靖、付琳、丁尧诸位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1〕 林沅:《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林沅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韩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THE INFLUENCES OF THE BRONZE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O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EARLY ZHOU DYNASTY

by

Chen Xiaosa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 that the bronzes of Zhou Dynasty in the Central Plains were constantly influencing the bronze cultures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during their developments. This viewpoint tends to make us neglect the adoption and absorption 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peripheral areas by the bronz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its develop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mold parting methods, décor motifs, general shapes and other factors of the bronzes,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a kind of *kui*-dragon design in curling-cloud shape and decorated with “∞”-shaped pattern which was seen on the bronz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had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erms of general shape, there were also five kinds of *ding*-tripods related to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were the *ding*-tripods with wide mouth and shallow belly, the *ding*-tripods with contracted neck, the *ding*-tripods with raised strip in abdomen, the *ding*-tripods with sagging belly and the *ding*-tripods with shallow belly and short legs. Some of these bronzes found in the Central Plains had typical style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ome of them have the shapes of typical styl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but their decors and/or details of parts have absorbed som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bronzes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howed the hybrid of two kinds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terms of weapon, the swallowtail-shaped spearheads seen occasionally in the Central Plains would also appear under the influence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erm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yong*-bells which appear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since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had similar decors with that of the *yong*-bell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ut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e decors of the bronze vessels of the Central Plains; down to the mid and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styles of the *yong*-bells' decors of the Central Plains gradually became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other bronzes of the same area, and meanwhile, long inscriptions began to appear on the *yong*-bells. This phenomenon reflected that the *yong*-bells also had a procedure of conversion from the styl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o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s.

责任编辑：黄益飞

图版壹



1. 高砂脊 M1 2 鼎



2. 资兴旧市春秋墓鼎



3. 长沙金井鼎



4. 长由墓 3 号鼎



5. 扶风齐镇鼎



6. 扶风齐镇鼎底部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图版贰



1. 屯溪 M3 11 鼎



2. 凤雏甗



3. 应国墓地 764 号鼎



4. 叶家山 M1 14 鼎



5. 万城北子鼎



6. 平顶山 M85 14 鼎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1. 枣庄东江 M3 鼎



2. 长由墓 2 号鼎



3. 赛克勒藏 18 号鼎



4. 赛克勒藏 19 号鼎



5. 枣阳吉河鼎



6. 平顶山 M84 74 鼎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图版肆



1. 大港母子墩鼎



2. 溧水乌山鼎



3. 舒城五里村鼎



4. 铜陵鼎



5. 巢湖鼎



6. 丹徒司徒转厂鼎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图版伍



1. 叶家山 M111 7 钟



2. 宝鸡竹园沟 M7 12 钟



3. 式痰钟



4. 式痰钟



5. 铜陵顺安鼎



6. 宜昌万福埡鼎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图版陆



1. 番君盘



2. 番君盘内底



3. 资山盘



4. 资山盘内底



5. 肥城小王庄盘



6. 肥城小王庄盘内底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